

四、拍攝後記

《台灣黑電影》這部片，從 2003 年 11 月簽約到 2005 年 6 月交片結案，製作期大約是一年七個月的時間。

回想這一年七個月的時間，只覺得過得非常快，因為交片的時間壓力很大，幾乎每天都在想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把資料蒐集得再齊全一點，把影片的內容再充實一些，又有多少時間可以好好的把手上有限的材料做最好的安排。

之所以在時間上會感到如此不足，是由於《台灣黑電影》這個拍攝案，主要面對的挑戰在於蒐集久被遺忘的社會寫實片經典，這些當年以商業為目的的影片，因為不被認為具有藝術文化收藏價值，許多當年投入的業者，如今也已經離開影壇，改做其他事業，以致於許多重要的經典如《女王蜂》、《黑市夫人》等，才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，就皆已散佚。我們透過各種管道探訪這些影片的下落，從國家電影資料館到專營廟會露天放映的民間業者，最後蒐集到並取得版權人同意而使用在影片中的，有《錯誤的第一步》、《上海社會檔案》、《瘋狂女煞星》、《癡情奇女子》、《女王蜂》、《女性的復仇》、《凌晨六點槍聲》、《少女集中營》、《霹靂大妞》等九部。比較遺憾的是，也屬經典的《黑市夫人》一直到最後都還是沒有找到。

尋找、聯絡與等待回應的過程非常漫長，當最後一部找到的《女王蜂》從西門町巷弄深處的日新電影社裡「出土」，卻又因為拷貝過於陳舊，被沖印廠拒絕過帶，不得已只好情商擁有這個拷貝的日新電影社周老闆，安排在某一場廟會慶典中放映，我們再用攝影機翻拍銀幕的工程終於完成時，已經是 2005 年的三月份了。接下來的時間，剪接、套片、混音、製作光學聲帶、字幕、翻譯、沖拷貝等過程，幾乎是連滾帶爬地趕工，由於輔導金製作合約上訂有過期一日罰款千分之二製作費的罰則，我們常常光想到累積的罰款就開始胃痛頭痛。不過還好這個罰則最後沒有真正實行，特此感謝輔導金執行單位國家電影資料館。

《台灣黑電影》可說是我到目前為止所執行過最複雜的拍攝案，除了影片內容牽涉許多舊電影版權的協調，拍攝媒材也首次從個人化的 DVCAM，前進到必須團體合作的電影膠片領域，這對從大學以來就一直接受 Video 訓練的我來說，是震撼教育，也是寶貴的學習機會。雖然我自認為，《台灣黑電影》和我之前拍過的作品一樣，出發點都是非常私人的影像創作，但是由於題材與媒材的性質，卻使得這部作品能有超越「個人化」(不論是工作方式或是影片題旨)的格局與影響，讓我必須思考更多「我」之外的事情，這些壓力與挑戰，相信都會變做讓我成為一個更好創作者的助力。

本片能夠完成，要感謝的人太多。新聞局輔導金提供主要的拍攝經費、電資館在影片拷貝及文獻資料的使用上給予許多協助與優惠；江日昇先生、蔡揚名導演、王重光導演慨然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版權所有的影片片段；還有許多業界前輩有形無形的幫助，親戚朋友的兩肋插刀，才使得這個異想天開又牽連甚廣的紀錄片構想，有了被實現的可能。

《台灣黑電影》在 2005 年的台北電影節首映兩場後，許多年輕的朋友看了這些「重新出土」的片段，都驚訝地對我說，沒想到原來在二十幾年前（他們出生之前），台灣電影就已經有這麼生猛的場面與意念；也有外國人開始懷疑，《瘋狂女煞星》其實是《追殺比爾》的原版；更有一位朋友說，原來陸小芬被五個歹徒追到黑夜工地的場面，就是她盤據腦中多年的惡夢，她一直以為那些奔跑與歹徒猙獰的面孔，是她夢裡出現的畫面，直到看過《台灣黑電影》，她才恍然大悟，那可能是在尚未有分級制度的年代裡，年幼的她曾經在戲院裡經歷的震撼教育。

我想這應該就是《台灣黑電影》這部片最大的價值與意義，重新找回台灣電影史上曾經深深留在觀眾記憶裡的畫面，並試圖將這些影片與當時的社會情境扣連，讓銀幕背面的現實土壤和銀幕之前被催眠的觀眾們互相找到彼此。這樣尋找的目的，大至開發台灣電影研究裡未曾有過的面向、填補上沒有人想提的一塊，小至為一位惡夢連連的朋友解開多年的疑惑；原始初衷的，意料之外的，都是這部紀錄片確實造成的影響。

《台灣黑電影》因為題材、人事、預算、導演能力等各種條件的限制，使得最後完成的成品，與企畫時的野心有所出入，不過總算能夠把影片完成，並且達到重新挖掘並思考「社會寫實片」的主要目標。而我也相信這部紀錄片與創作報告的完成，能對往後類似题目的製作多少有所助益，如此想來，這一年七個月的努力也十分值得。